

历史

《中国历史小丛书》:关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 大众化的个案考察

李燕

(北京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人文学院,北京 100120)

摘要:作为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的首套历史普及读物,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可谓这一时期史学大众化的典范。该书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二是主题明确,自成体系;三是文质兼具,雅俗共赏。这对当前做好历史普及工作、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史学大众化具有重要启示:必须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注意专业作者队伍的培养问题及以提升人民文化水平为旨归。

关键词:《中国历史小丛书》;吴晗;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大众化;北京教师进修学院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17)01-0075-06

DOI: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7.01.01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随着马克思主义迅速发展并占据学界主导地位,新中国历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十七年史学”时期。其间,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逐渐形成“写人民之史”和“为人民而写史”的学术自觉。作为这一时期出版的首套历史普及读物,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用力尤深、影响尤巨,可谓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大众化的典范^①。在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史学大众化的今天,考察《丛书》的编撰经过及主要特点,总结其成功的历史经验,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丛书》编撰始末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并运用唯物史观以建设新史学”作为一项时代命题,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史家的认同,而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各层次民众的历史认识水平,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继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宣布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后^②,1955年,为满足高级干部、历史工作者学习需要,标点《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标点二十四史、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三大史学工程”也渐次铺开。与此同时,改进历史教育、丰富人民大众的历史知识也成为当务之急,《丛书》正

收稿日期:2016-1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高校党建史研究(1949-1978)”(13CDJ015)

作者简介:李燕(1982—)女,山东济南人,北京教育学院教师教育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学术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E-mail:liyan7582@163.com

^① 关于“史学大众化”,学界存在“历史知识普及”“史学通俗化”“史学大众化”“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等说法。其内涵主要有二:一是指史学藉由各种媒介由专家、专门之学转而面向社会大众;二是指公众参与书写的史学,即公众由单纯的受众变为历史书写的主动参与者。从学科建构的角度来看,“公众史学”这一说法更合规范。而从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更宜采用“史学大众化”的表述。故此本文采用后一种说法,在内涵上则主要是就其前一层面而言。相关论文详参王记录《当代中国史学大众化研究的历程与理论反思》,《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3期,第126-133页;钱茂伟《公众史学的定义及学科框架》,《浙江学刊》2014年第1期,第80-86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决定》(抄件)指出,“以识字2000以上(即完成扫盲识字学习)到初中程度的工农兵及其基层干部为主要读者……编辑、出版通俗图书和期刊。”详见许邦编《书苑一秀:五十年代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内部出版物,1997年,第3页。

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上议事日程。

1958年秋季,在一次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师大会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倡议为青少年学生编一套较为全面系统的历史普及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①。为此,吴晗自任主编,并邀请尹达、白寿彝、刘桂五、任继愈、吴廷璆、何兹全、何家槐、何干之、汪篔、周一良、邱汉生、金灿然、邵循正、季镇淮、陈乐素、陈哲文、侯仁之、郑天挺、胡朝芝、马少波、翁独健、滕净东、潘絮兹、戴逸共24位专家学者组成《丛书》编辑委员会;同时决定由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担任助编^②,负责联系中学文史教师、物色作者及组织审读稿件,由中华书局负责编辑出版。

在选题方面,《丛书》最初是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中心,后来又逐渐增加了地方史话、科技史的内容。经吴晗与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副总编辑巩绍英研究,最终将编写计划扩大到300种。谈及该书的编撰目的时,吴晗表示,此举是为了丰富青少年和一般具有中等文化水平读者的历史知识,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以“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1]370}。同时,还要借此机会“培养一批年青的历史工作者,并且把北京市的中学历史教师作为作者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2]。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极富远见卓识的。

为了能够顺利开展编撰工作,吴晗及其领导的《丛书》编委会做了大量工作。在工作之

初,为了开辟稿源,同时也为了提高参撰者的学术和写作水平,吴晗曾先后两次组织召开北京市内50所中学校长和教师参会,动员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编写工作。为保证写作速度和稿件质量,编委会按时召开会议。吴晗不仅自拟选题,有时还亲自组稿,对稿件字数、内容提出明确要求,并注意随时了解读者的反映和发行工作情况。对于送审书稿或清样,他不仅通读而且修改文字、按时退还,还间或写几句肯定或赞扬的批语。^[2]编委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义务审稿,中华书局也对《丛书》质量严格把关,遇有疑惑则认真核对修订,确有难以定夺处则送请中宣部出版处审阅^[3]。

经过作者、编委、编辑的共同努力,《丛书》自1959年1月起陆续付印出版。至1962年,该书已出满100种。为此,编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扩大会议以示庆祝。《丛书》作者队伍也不断壮大,由北京市的历史、语文、政治教师扩至美术等科目的教师,由个人执笔发展到教研组、学校为单位集体撰写,由京内撰稿拓展为外地十七个省市投稿,由中学教师为主发展到中央多个部、科研机构的专家加入;读者对象也由既定的小学五六年级到初小一二年级的学生和认得两千字左右的工人、农民,扩至教师、干部及解放军士兵队伍^{[4]464-465}。

截至1965年,《丛书》共出版147种,累计印数在900万册左右,部分书目还发行了盲文

① 按,张习孔《吴晗同志与普及历史科学》一文称,吴晗“为青少年学生编辑出版历史科普读物的想法由来已久”,在担任北京市文教领导工作后,吴晗曾多次谈及重视学生的校外教育及为青少年学生编写课外读物的问题。因条件不成熟,其主张未能立即实行。直至1958年秋,在一次北京中学历史教师大会上,吴晗才提出编写《丛书》的设想并得到响应。杜任之《怀念革命史学家吴晗同志》亦称,1956年自己调入中国科学院编委会工作后,不时过访吴晗,其时吴正筹划编撰《中国历史小丛书》。则二人似皆以吴晗此一计划形成于建国后。白寿彝《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怀念吴晗同志》则云,顾颉刚先生在抗战期间曾计划编一部群众性的中国通史,并将此任务交办吴晗夫妇,后因故转至张荫麟手中,因此吴晗“要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的思想,显然是受顾颉刚先生的影响”。罗尔纲《怀吴晗》更称“吴晗在他年轻组织史学研究会时,就定有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计划,并列有目录,只因那时人材少,没有实现。”另据罗氏《忆汤象龙》,1934年吴、汤二人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该会“很重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在成立时会友间就曾经拟定并通过《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计划和题目”,因“印刷条件困难”,未果,吴晗日后主编《丛书》的想法便是据自前者;该文又云“这和史学研究会发起人汤象龙等同志的远见”分不开。查其《致汤象龙及复函》(1985年6月15日、6月25日、7月2日、8月24日),则此处行文曾经汤氏改定。合诸上文而观之,吴晗编撰通俗历史读物的想法确乎由来已久,其思想“受顾颉刚及张荫麟影响”之说亦大体允当,至于《丛书》目录是否据自史学研究会所拟计划及题目,因史料阙如,只能俟诸后考。以上引文详见吴晗著、常君实编《吴晗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6、53、39、26页(下引该书版本皆同此,余不注出);罗尔纲《罗尔纲全集》第20、2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0、338页。

② 即今北京教育学院前身,成立于1953年,1978年复院后更名为北京教育学院并沿用至今。

版。“文革”开始后,这一工作被迫中断。直至1978年,《丛书》才得以恢复出版,原有选题计划也适时加以调整。至1982年,包括重印、修订在内,该书已累计出版130种^①。其中,《南京史话》等书目还被译为外文,另有一些书目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发行。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又组织编辑了《丛书》合订本,并于当年开始陆续出版。

二、《丛书》的主要特点

在《丛书》编写过程中,吴晗曾多次邀请编委会、专家与作者座谈交流,并就编撰的主旨思想、具体要求等问题统一认识。他引用毛泽东之语提出“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吴晗认为“要彻底改变文化上一穷二白的面貌,必须把提高了的东西普及给全国大多数人,人人懂得点历史”;同时,要尽最大努力提高历史科学的水平,“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提到超国际水平的程度……这是不应该的、可耻的,也是无从想象的”,“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提高,而且还应该把提高的成果用通俗的文字普及给广大人民群众”^{[5]248-249}。

经过反复研讨,编委会还就《丛书》编撰的具体要求达成共识,这就是“要求书的内容立场、观点正确,史事叙述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文字通俗、生动流利。都附以必要的插图,要求做到图文并茂,读者爱读。”而要做到通俗,则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稿子写好后,“先给自己的幼年儿女读,孩子读懂了,而且有兴趣”,才算通过,否则就要重新改写;二是把稿子交给外行读,特别是专题史话类书稿,“只有连外行人也能完全读懂,才算达到通俗的地步”^{[4]465}。上述原则的提出,为《丛书》质量提供了重要保证。

从整体来看,《丛书》内容大致可分为历史人

物、历史事件、专题史话三大类,并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如前所述,《丛书》选题计划是在具体编撰过程中不断完善并最终确定的,其内容涵盖史前文化、人物事迹、作家著述、农民起义、军事战争、古籍选介、历史古迹等方面。以历史人物为例,“文革”前先后出版《秦始皇》《张衡》《欧阳修》《老子》《容闳》《阎立本和吴道子》《岳飞》等单行本84种,共涉及92位历朝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科学家、民族英雄等,有29种重印或多次刊印,2种再版。专题史话方面,截至1965年,共有32种单行本出版,内容涉及五谷、丝绸、蚕业、数学、钢铁、印染、造纸、古籍、报刊、印刷、漕运、邮电、铁路、科举、京剧、飞行、汉字、长城、名城、古迹等,其中径以史话名题的21种,有22种重印,12种再版或多版^②。

二是主题明确,自成体系。《丛书》虽然题材广泛却并不杂乱,由于注重编委会整体策划并多次深入研讨,每种书各有明确的主题,它们单独成册但彼此又有着内在关联,可以分门别类纳入《丛书》,因而整套书脉络清晰,并在结构上自成体系。时人曾指出“《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本一本地孤立起来看,似乎是片段的,零碎的,但是从整套丛书的总和来看,却是相当完整而有系统的。”^[6]总体来看,《丛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既关注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发展的阶段性,又兼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从而比较全面、系统地勾勒出我国的历史概貌和文化传统。在具体撰写过程中,《丛书》还注意联系实际,体现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同时该书还将书标设计为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万里长城,以与主题相呼应。

三是文质兼具,雅俗共赏。作为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文质兼具要求史家撰述应当文直事核、

^① 详见冯惠民《〈中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始末》,《编创之友》1982年第3期,第104-108页。张习孔1990年所撰《吴晗同志与普及历史科学》一文称,《丛书》共计出版230多种,累计印数1500万册,详见吴晗著、常君实编《吴晗全集》第1卷,第67页。

^② 文中数据按《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49-1991)》统计。1978年后,经中华书局整理、续编,历史人物专题又出版单行本53种,涉及59人,其中2种重印。具体书目详见中华书局总编室编《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49-1991)》,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76-499页。另吴晗著、常君实编《吴晗全集》所收《丛书》目录亦可参看,惟惜该书未著录版次、印次信息,个别书目、著者项似亦有出入,详参前揭书第10卷附录八,第452-459页。

文质相称^①，这点同样在《丛书》中有所体现。虽然每本仅一两万字，但《丛书》却十分注重对内容的考信，并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如在撰写《诸葛亮》《长城史话》《〈四库全书〉史话》等书稿时，编辑与作者曾多次查证史料、函访专家，确实难以定论的则存疑待考^[7]。在叙述风格上，该书文约事丰、图文并茂，既简练严谨又通俗生动，因此曾被时人赞许“于史学普及之中，寓专攻欣赏之妙”^{[8]68}。特别是贾兰坡《中国猿人》^②、任继愈《韩非》、何兹全《祖逖北伐》、侯仁之《徐霞客》、周一良《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吴晗《海瑞的故事》、戴逸《北洋海军》、潘絮兹《绘画史话》等，由于撰者都是在相关研究领域内学养深厚的专家，对于上述原则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因于此，《丛书》出版后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62年，该书出版100种时，有编者和记者曾走访科学、教育、文化出版界，并在一些中学召开师生座谈会，以广泛征求意见。有论者认为：“书虽小，但它的作用、效果、影响却不小”，读者能从中“获得知识，受到教育，得到鼓励，吸取经验”^[6]。1963年，《丛书》被教育部列为中学课外读物。许多文史教师将其作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目，工人们也表示该书“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丰富了他们的历史知识，增长了他们对许多历史知识的了解”^[9]。书中有关古人爱国、求真精神的记述，也对读者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多读者写信给《徐霞客》的作者侯仁之，表示被徐霞客勇敢顽强的治学精神所感动，还有人“准备把有关故事编写成剧本，在厂里演出”^[10]。读者们普遍反映这是一套“良好的历史科普读物”，并称赞吴晗“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8]67}。

此外，由于《丛书》编撰人多具有作者与读者的双重身份，通过参与这一工作，许多中学教师“在学校里成为好教师”，“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队伍”^{[4]465-466}；高校和中学的学术探讨

增多，人们写作的积极性相应提高，学术气氛也得以活跃。受此影响，不少专家也在研究之余兼写一些普及读物，以致全国“一度掀起重视编写普及读物的热潮”^[11]。

三、《丛书》的现实启示

《丛书》自问世以来，即成为书店畅销不衰的热门书。1978年恢复出版后，许多史学界、教育界专家及普通读者不断写信，希望继续出齐、出好《丛书》。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它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12]。时至今日，《丛书》对于做好历史普及工作、继续推进史学大众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概而言之，这些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必须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由于《丛书》兼顾普及与提高，因此它的出版不仅繁荣了出版园地，更为推广和普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进步，史学大众化也突破了以历史普及读物为主要呈现方式的限制。面对史学书写与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如何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也成为史学大众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应当看到，“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通俗史学的出现，不仅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一种需要不断培育的有利的‘史学生态’。”^[13]因此，一方面，史学研究要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应当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不断提升专业研究水平，并在学理上加强对史学大众化理论与方法建设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教材体系建设、传播载体建设等，积极探索史学普及的新途径、新形式、新方法，出版更多雅俗共赏的高质量史学作品，使学术研究与成果应用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以便更好地发挥史学资政育人的社会

① 文质作为一对范畴，最初被孔子用来阐述君子的修养问题，其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后来被引入史学领域，用来探讨历史撰述原则、史家修养等问题，如《汉书》称赞司马迁“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刘知幾提出“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以上详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61页；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8页。

② 该书于1979年2月更名为《北京人》。

功用。

其次,应当注意专业作者队伍的培养问题。正如实力雄厚的作者团队是确保《丛书》质量的关键因素一样,在继续推进史学大众化的今天,做好历史普及工作同样离不开专业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从现实来看,能深入者未必能够浅出;而“没有深刻内涵的浅出,便不可避免地流于简单粗糙”^[14]。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众史学热”的不断升温,史学大众化的主体也由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扩至公众,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民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参与到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在相关成果不断增多的同时,一些作品中也存在史观错误、史实失当、内容庸俗化的倾向,这就对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作者队伍提出了现实要求。对此,应当打通大、中、小学的资源壁垒,加强教育、文化、出版各界的行业沟通,倡导专业史家积极介入,就真实性与艺术性、学术性与趣味性等史学大众化原则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通过“大家小书”“小题大做”等方式合力协作,以切实培养和提高专业作者队伍的研究、教学和写作能力。

最后,还需强调以提升人民文化水平为旨归。正如吴晗所言,“为下一代服务,为广大工农兵和机关工作者服务,这个要求是不会过高的”^{[13]370}。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应当致力于为为人民服务,《丛书》在这方面也提供了极好的例证。许多当代著名学者专家都曾撰文感怀这位伴随自己成长的“良师益友”,如陈平原说自己“少年时就喜欢读中华书局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15];莫砺锋也称中学时代读过《丛书》,“受益匪浅”^[16];楚泽涵忆及父亲楚图南与吴晗的交往,也提到自己很多历史常识都“得益于这套丛书”,并称“之所以没有被荧屏上穿着古装的大辫子和小辫子给‘忽悠’了,在颇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套丛书。”^[17]作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史学大众化涉及到向人民尤其下一代提供怎样的历史教育,并关乎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情操问题。因此,推进史学大众化应当着眼于人民文化水平的提升,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普及工作绝不可等闲视之。

历史学生发于大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可以说,大众化是史学的“生机所在”,也是其“起点和归宿”^[18]。白寿彝先生曾指出“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是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就其性质和意义而言,这个工作“是很值得重视并应该大力加以发展的”^{[19]41}。作为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大众化的典型个案,《丛书》将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并涉及史学大众化的意义原则、指导思想、途径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从而为此后的学术赓继与传播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就此而言,回顾并总结《丛书》编撰历史与成功经验,对于做好当前的历史普及工作,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史学大众化确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吴晗.一年来北京史学界的学术活动——在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话[M]//吴晗全集(1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2] 李侃.吴晗与中华书局[C]//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15-23.
- [3] 王代文.回忆《中国历史小丛书》[C]//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124-130.
- [4] 吴晗.论历史知识的普及[M]//吴晗全集(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5] 吴晗.关于历史知识的普及问题——对武汉史学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历史系同学的讲话[M]//吴晗全集(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6] 李侃.读《中国历史小丛书》[N].人民日报,1962-10-11.
- [7] 冯惠民.《中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始末[J].编创之友,1982(3):104-108.
- [8] 张习孔.吴晗同志与普及历史科学[M]//吴晗全集(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9] 柏生.传播通俗史地知识的读物[N].人民日报,1962-10-13.
- [10] 贺新创.编写深入浅出的历史普及读物[N].文汇报,1962-02-17.
- [11] 王宏志.吴晗[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55.
- [12] 刘景荣.吴晗与普及历史知识[J].历史教学问题,2001(5):27-30.
- [13] 李小树.关于通俗史学的几个问题[J].博览群书,

- 2009(5): 10-14.
- [14] 齐世荣. 要促进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J]. 历史教学, 2011(1): 3-5.
- [15] 陈平原. 兼及“青少年”与“非专家”: 关于“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J]. 博览群书, 1999(10): 35-36.
- [16] 莫砺锋. 宁钝斋杂著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2: 222.
- [17] 楚泽涵. 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 [J]. 炎黄春秋, 2007(1): 52-57.
- [18] 李小树. 论 20 世纪中国史学大众化的百年历程 [J]. 贵州社会科学, 2000(3): 86-91.
- [19] 白寿彝. 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怀念吴晗同志 [M] // 吴晗全集 (1).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田 军)

Chinese History Series: a Case Study in History Popularization During 17-year Period of New China

LI Yan

(Faculty of Education for Teacher of Liberal Arts,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120, China)

Abstract: As the first history popular books published in the 17-year period of New China, *Chinese History Series* which edited by Wu Han was the model of history popularization. There were three main features of *the Series*. First, it had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and the content was really rich. Second, the theme was clear and the book established it's own system. Third, there was a well-balanced admixture of the literacy and essence and the book was suit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Therefore, it was significant for us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In the first place, we must correctly handl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mprovement. In the next plac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professional author training. Finally, it wa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people's cultural level.

Key words: *Chinese History Series*; Wu Han; histo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uring the 17-year period of New China; popularization; Beijing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